

《晨报副刊》时期鲁迅的报刊创作与精神转型^{〔*〕}

○ 马 梅, 李冷月

(安徽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晨报副刊》在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有着非常独特而重要的地位,鲁迅在其间的杂文创作数量多而且成就高,但长期以来对《晨报副刊》与鲁迅的历史互动性关系的研究却很少。本文将视野拉回到20世纪20年代,将研究放到《晨报副刊》时期的鲁迅,以鲁迅的发稿创作为微观切入点,深入分析了在那个历史背景下鲁迅的创作思想与传播思想的转变。

〔关键词〕晨报副刊;杂文;转向

《晨报》的前身《晨钟》,1916年8月15日创刊^{〔1〕},1918年12月复刊改组为《晨报》,在第七版刊载小说、诗歌、小品文和学术讲演录,随正张赠送,从《晨钟》到《晨报》,第七版始终单独辟出,虽带着旧式副刊所共有的一定消闲趣味,却也颇有名气。自1919年2月7日,副刊宣布改革,增添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栏目,开始明显地倾向于新文化运动,1920年7月,第七版由孙伏园主编,此时副刊已声名鹊起,1921年10月12日,第七版改出四版单张并定名为《晨报副镌》^{〔2〕},副刊着重宣传新文学,繁盛一时,同时按月出版合订本,至1928年6月《晨报副刊》停刊。虽然从文学角度说起副镌,1925年起为徐志摩的“新月派”所控制时期名气稍大^{〔3〕},但早期副刊的传播意义与历史地位,以及报纸副刊的发文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已成为典型的近代报刊研究个案。

作者简介:马梅(1976—),安徽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新闻系主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主要为新闻传播理论与实务;李冷月(1984—),安徽师范大学传媒学院2011级传播学研究生。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AHSK11-12D141)的阶段性成果。

后来虽有学者纯粹从政治角度认为《晨报》过多依附军阀派系,并逐渐右倾走上了与革命不同的道路,但解读《晨报》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地位时,都不得不承认它一定程度上坚持了作为时代“传播”媒介的核心理念定位——推进历史变革、社会进步的舆论传播工具。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后来的《晨报》更为世人所铭记,但其前身《晨钟》创刊时由李大钊等人主编所铺垫的历史基础,奠定了后来整个《晨报》及其副刊的历史定位及传播思维,即使后来的报纸正张渐次失去了进步作用,但有报刊最初的传播思想作为编辑前提,才有了鲁迅与其他进步知识分子在副刊的撰稿支持与推进新文化的传播阵地选择,以及那段为世人铭记的特殊“启蒙”创作期。

但是,对《晨报副刊》与鲁迅的历史互动性关系的研究却很少。笔者在中国知网以“晨报副刊与鲁迅”为主题进行检索,只找到86篇文献(截至2013年7月2日20点)。这些文献还多是仅分析《晨报副刊》,且多是从副刊促成中国现代报纸产业化运作、加速报刊编辑价值观念嬗变、通过启蒙时代的主旨影响新文化思想与现代文学创作、建构现代知识分子舆论平台、拓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引进西方思潮、传播马克思主义等几方面进行简要阐释。其中涉及鲁迅的,往往是分析鲁迅的现代文学创作脉络,或单纯研究鲁迅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价值取向。其中直接研究《晨报副刊》与鲁迅互动关系的只有2篇,却也没有对鲁迅在此时期创作背后其个体自省性价值思考的转变进行较全面的研究。^[4]

基于此,本文将视野拉回到20世纪20年代,将研究放到《晨报副刊》时期的鲁迅,以鲁迅的发稿创作为微观切入点,寻觅在那个历史背景下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与传播精神的转变。

一、鲁迅在《晨报副刊》时期(1919-1924)渐变的报刊创作

通过在内容上传播启蒙思想、极力推动新文化运动,在形式上广为开设众多新潮专栏,如讲演录、特载、论坛、小说、歌谣、杂感、译述、科学谈、古文艺、传记、剧本等,《晨报副刊》最终开创了近代报纸副刊民主改革的先例,成为一份综合性较强的副刊。它对新文艺、自然科学、西方社会科学、大量近代世界著名作品等的着力强调,成为时代亮点。而这些专栏不抵制任何思想、作者在其上发表己见:《晨报副刊》既发表李大钊的《社会问题与政治》,也发表梁启超、黎锦熙的讲演辞;既发刊《俄国革命纪念》专辑,又发表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正是这种学术争鸣的大好景象,才使得各种流派、各种倾向的作品和译文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吸引了“五四”时期的许多重要作家,其中就包括鲁迅、冰心、郑振铎、林语堂、汪静之、沈尹默、梁实秋、冯雪峰、熊佛西、焦菊隐、赵景深等等。至于后来人说鲁迅是因为撇不开孙伏园以同乡交情所催迫而在《晨报副刊》发稿,则是另一种闲谈说资了。而鲁迅给“晨报副刊”起名的“晨报附刊”则长时间列在每版版头,也是人们经常把鲁迅与《晨报副刊》相联系的另一重要原因。

整体说来,1917年8月鲁迅接受钱玄同的劝说,决定提起笔来投入反封建

战斗,其后一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文学批判,但作为一个思想家,鲁迅拥有着自己独特的哲学观念,学术界也多从其文学作品中研究其碎片化的哲学脉络。笔者单就其曾为《晨报副刊》(本文均包含《晨钟副鏖》之名,以下不再列述)主笔,研究这段时期鲁迅在创作报刊文章时所体现的传播思想的渐变。从转载《狂人日记》到1924年10月31日在副刊第1版上译完《苦闷的象征》第二部分,鲁迅在《晨报副刊》上共发表了各类作品(小说、杂文、译作、评论)近60篇,其中译文12部、杂文26篇。

下表大致整理出鲁迅首发在副刊上的作品:

表1 鲁迅在《晨报副刊》的创作一览表

发表日期	文章名称	栏目	署名	主旨
1919.12.01	一件小事	《晨报·周年纪念增刊》		通过对最底层劳动人民“车夫”的描写,探求民族及国民性的希望所在
1921.05.06	“生降死不降”	“杂感”栏	风声	对民族社会、国民性的批判,评议明清制度,言自己“受了革命党的骗了”
1921.05.07	名字	“杂感”栏	风声	评议人性及文者心理、“古人之高深为不可测”
1921.07.08	无题	“浪漫谈”栏	风声	讽喻社会黑暗势力的“唤醒国民”
1921.10.23	智识即罪恶	“开心话”栏	风声	借助虚无哲学家的话和运用调侃笔法,批判守旧者和复古派,讽刺了复古派对新文学的诅咒
1921.11.03	“则皆然”	“杂感”栏	尊古	辛辣揭露讽刺反动军阀及“孔圣人”之门徒子孙的丑恶。
1921.11.04	事实胜于雄辩	“杂感”栏	风声	讽喻当权者的掌控,以及弱者的不争与不幸
1921.12.04	阿Q正传	“开心话”栏“新文艺”栏	巴人	国民性的批判,讽喻社会强权与弱者
1922.02.09	估《学衡》	“杂感”栏	风声	认为守旧派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除了只有发表的勇气外,对新文化运动毫发无伤(《学衡》全载文言文,非议新文化运动)
1922.04.09	为“俄国歌剧团”	“杂感”栏	鲁迅	扬赞的背后讽喻中国所谓文化与国粹的“沙漠”本质,坦率自己的寂寞和怯弱,对自身的批判
1922.04.12	无题	“杂感”栏	鲁迅	对人性的批判与希望,对自身的反省,觉出“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

发表日期	文章名称	栏目	署名	主旨
1922.09.20	“以震其艰深”	“杂感”栏	某生者	批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国学家
1922.10.03	破《唐人诗话》	“文艺谈”栏	风声	鲁迅对传统文学的审慎研究,批评文艺界“胡闹”的学术态度
1922.10.04	所谓“国学”	“杂感”栏	某生者	批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国学家及“国学”
1922.10.09	儿歌的“反动”	“杂感”栏	某生者	讽刺反对新文学的言论,“某生者”讽刺鸳鸯蝴蝶派的公式化小说开头
1922.10.10	兔和猫	“文艺”栏	鲁迅	寓示社会性矛盾的批判,极度爱憎的人道精神,深受爱罗先珂思想影响
1922.11.03	“一是之学说”	“杂感”栏	风声	批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国学家,讽刺其文章及论点的荒谬性
1922.11.04	不懂的音译	“杂感”栏	风声	批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国学家
1922.11.09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杂感”栏	风声	文艺批评,以及需要的一种严格的自剖精神与勇气,论及批评的标准、尺度、边界
1922.11.17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杂感”栏	风声	文艺批评,较为严格的自省精神
1922.11.18	即小见大	“杂感”栏	鲁迅	对新知识阶级的剖析批评,在《两地书》曾直言是“人道主义或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
1922.12.01	不周山	《晨报四周周年纪念增刊》	鲁迅	寻求重塑民族魂灵,以文学“立人”思想逻辑延伸,企图再造中国传统文化独立的人格精神,却一步步走向批判古典文化悲凉的尖锐批判,形成一种“油滑”的批判自我否定意识
1923.01.15	关于《小说世界》	“通信”栏	唐俟	评议文艺界现状以及旧小说文字,对“记者先生”(孙伏园)言“对于《小说世界》是不值得有许多议论的”
1923.01.17	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杂感”栏	鲁迅	批评在学术界借“新艺术”之名行事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新知识阶级内的批判

发表日期	文章名称	栏目	署名	主旨
1923. 08. 21	呐喊自序	《晨报·文学旬刊》	鲁迅	批判国民奴隶性,警悟力的战斗檄文。写于1922年12月3日
1923. 09. 14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杂感”栏	雪之	支持新文学运动,考究旧文化与新文化,讽刺将“勇士”解为“读书人”
1923. 12. 01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文艺评论”	鲁迅	突破陈旧的文学观念,赋予国学新的见解,平民化艺术,文学考证
1923. 12. 15	寄语母亲	“来件”栏	周灵均	文艺批评,“到了不能尽情地流露时,那才是真爱的表现呢”,孙伏园言“在现代这种(雍容礼让)的社会里,这样大胆的作者久矣夫不会遇着了”,鲁迅在删集后只留下《草儿》的《暮登泰山西望》,《女神》的《梅花树下醉歌》,《尝试集》的《他》
1924. 01. 17	对于“笑话”的笑话	“杂感”栏	风声	针对“整理国故”风行思潮的反应,对其错误转变的敏锐探察,讽喻范仲澐《整理国故》讲演
1924. 01. 27	奇怪的日历	“杂感”栏	敖者	批判“一年一年的加增昏谬”的社会现实
1924. 01. 28	望勿“纠正”	“杂感”栏	风声	尖锐指出“流弊却无穷”的对译本校改以及“整理国故”内容方向转化带来的弊端,支持新文化运动
1924. 03. 27	肥皂	“小说”栏	鲁迅	揭露假道学家的污秽,批判封建复古派的堕落
1924. 09. 28	又是“古已有之”	第三版	某生者	批判骇人听闻的社会现象
1924. 10. 02	答二百系答一百之误	第四版	某生者	评议文学界以及编辑、校者、手民所应有的严谨度
1924. 10. 02	文学救国法	第四版	风声	讽刺文学界中救国的“博士学者”的腐陋思想

从表格可以看出,他所作文章以杂文居多,具备强烈时效性,多为针对一时之议,由早期的小说创作转战在日报上兼具文学性与新闻性的杂文创作,这是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报纸副刊兴盛,其个人创作生涯与时代思想的一大转变。

(一) 文体选择:从主创小说转战日报的杂文创作

鲁迅所言的“能爱能憎才能文”是他一生创作的源泉,也是他作为一个时代思想家、作家给世人留下最有力的个性诠释。他曾主编或协编并为 20 多份报刊撰稿,他自言“文人的铁,就是文章”,利用报刊、杂志等作为战斗利器,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传播思想,也是他给后人留下的珍贵研究。他最醒目的战斗业绩由《晨报副刊》开始转折——着力编著杂文,“由鲁迅倡导、实践并提供了标准模式,从一种附属文体变成了具有独立的、完整形态的文学样式”^[5]。这种文学创作上的历史转变,内涵着个人思维哲学以及社会理论的转变,正如他后来所言“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6]。

鲁迅早期小说,寻求中国近代阶层从城市到旧农的各方关系所处的国民希望与劣根性所在,反省批判旧社会存在的落后症结,以强烈的批判启蒙意识去审视社会问题,其小说题材也多关乎切身问题。当时副刊在孙伏园刊发《人生价值》的“立人”导向下,就连续发表了鲁迅针对国民原罪的小说如《肥皂》、《故乡》等。“信息传递手段可以引起‘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每一种传播媒介都是制度发展、公众反映和文化内容的渊源”^[7],日报的兴盛、副刊的崛起,副刊本身一定消闲性的传播要求——太过于沉重的思想与内容,在开通风气的时代传播环境中,并不适合日报的时代传播语境,以及日报副刊对小说在结构进展与内容悬念上的限制,都不及类似随感录的杂文在内容篇幅及主旨自由的出版实践。从上述列表的文章可以看出,鲁迅加大了杂文的创作,由国民性的批判渐转为对文化哲学和文体痼疾的短篇聚焦,也更易被副刊主要阅读者——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新知识分子所接受。总体而言,社会变革中的媒介及传播文本,双重影响着传播者个人创作主张与受众对内容的接受。

鲁迅在 1921 年 7 月 31 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言道“孙公因家有电报来云母病,昨天回去了;据云多则半月便来北京。他虽云稿可以照常寄,但我想不如俟他来后再寄罢。……潘公《风雨之下》实在不好,而尤在阿塞之开通,已为改去不少,俟孙公来京后交与,请以‘情面’登之。”^[8],这段话可以看出鲁迅对刊载于《晨报副刊》文章的编辑选择性。信中提及的“孙公”言“他那时写的稿,除了登在《新青年》上的以外,大都寄给了《晨报副刊》了。”^[9]既然稿子大多在《晨报副刊》,那么他在《晨报副刊》的杂文创作之多实际上就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就是杂文为多,在这发表的杂文主旨也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倾向。

还有个有趣的插曲,说明此时期鲁迅的针对时局之创作。1923 年 4 月 29 日《晨报副刊》刊载张竞生所作《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开始了一场民国爱情大争论,为此该刊辟“爱情定则讨论”专栏。6 月 12 日该刊发表了陈锡畴和钟孟公的两封信。前者主张“中立态度”,要记着保持“第三者的地位”;后者则攻击这次讨论,认为“除了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左证之外,毫无别的价值”,并“忠告”记者应定出期限,“至期截止”,以免“青年出丑”。本没打算完全介入的鲁迅在看到这番言论后致信孙伏园,建议不妨继续讨论下去,

孙伏园刊载鲁迅相关来信后,肯定“他好像动物学家对于毒蛇,心理学家对于疯子,医学家对于传染病菌,别人都吓得掩耳却走,他只丝毫不动声色的取着一种研究的态度”〔10〕。

可以说,自1918年9月,鲁迅刊载的小说逐渐减少,开始更多地撰写关乎知识分子切身问题的檄文,此时的他聚焦收集各种报刊上的其他言论及材料,针对不同出版主旨的不同报刊,选择发表不同创作主题的稿件,迅疾地传达自己的意见,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30年代,为后人留下了铮铮之言。报刊传播业特别是副刊的兴盛,给鲁迅提供了实战、迅疾反映的传播空间,一篇篇张扬独立批判思考的文章反过来又强化了那个时代报刊的传播效应。

(二)传播主旨:从笼统的国民性批判转向新知识分子的自省自觉

仔细剖析鲁迅这一时期创作的文本,透视作家的精神结构,可以发现,作为精熟传统文化、具有现代意识的时代思考者,在知识分子关乎国家民族未来及文化走向产生价值分歧的传播背景下,鲁迅也由早期笼统空洞的国民性批判走向了现代文化突围与文艺文体阐释学的抗争,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同时质疑其社会传播效应。特别是1922年前后,鲁迅对新知识分子内部的自省批判,对现实与文化传播现实的权衡,其“渡世精神”指向于阶层价值关系扭转与重塑民族希望(包括文化立足)所在的寻求上。在这段期间他的作品创新力为先觉者的自苦与挣扎所冲击,《为“俄国歌剧团”》、《不周山》、《兔和猫》等都印证了这种渐变。对旧知识分子从最初的抨击到后来的末路同情,此时的他置身于社会阶级的重新定位中,不再以冷静剖析的启蒙者去宏观指点,而是以介身其中的自觉自省去看待阶级价值关系、新文化新文艺的重塑与广泛寻求新的哲学思辨的突破,如《对于批评家的希望》。当时报刊的各种思潮言论带给了鲁迅具体的聚焦冲击,《晨报副刊》的兼容气度为他“救国民于腐朽”的抗争探索提供了传播实践空间。鲁迅在副刊的众多译作也都展示了他在寻求新的“合理”的适宜于生长在中国特殊文化语境中的“拿来理论”,副刊所建立的舆论舞台,也见证和加速了知识分子自身文化理论选择特色的“变异”,鲁迅正是最先分化出来的一批。

此外,后人常提及的使得孙伏园愤而离开《晨报副刊》的那首鲁迅的《我的失恋》,最终发表于1924年12月8日《语丝》周刊第四期。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初恋》。”后又在《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谈到本篇时说:“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虽然鲁迅常“笑言”自己“过往”,认为自己此时的“格局小”,只是“一、两件小事”的不完善评论,但其在创作内容开始更注重了新闻性、时效性要素,更多是以立足微观现实事实的立论批判,宏观上确实初步确立了被后世称为“民族脊梁”的鲁迅式创作模式。他以感召更多报刊读者为创作基础,开始较少地使用宏观社会理论概念去“表达”对时局的责任感或者说愤慨不平的挣扎,正是有了这段时期创作的实践转折,才有了之后更被世人所推

崇的《自由谈》。

(三)受众群体:从精英受众到社会各阶级读者

综合性的副刊所需要体现的思想高度、人文精神、时下风貌、民主意识、历史责任感等较完整地体现在《晨报副刊》中,这种综合未分化的大众市场给了副刊在独立于正张的革新思想时,能够给各种撰稿人阐释主张的客观包容性。副刊极力组织各种批评言论对持,如上文提到的“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对政治问题的讨论、对新文艺与现实主义文艺现实的报道等,吸引当时社会各层级的读者与新知识分子在无意识引导下进行个体的价值思索。稳定的受众及文化启蒙制高点的定位,在当时社会加深了副刊传播的社会功能,扩展了它所提供的公共领域影响力,给撰稿人构建了当时较有力的传播展示平台,鲁迅由起初被邀稿到后来主力创作便是正面的见证。

受众的需求决定了只有与时俱进的传播元素才能拓宽媒介的社会主流话语空间,即使后来的《晨报》正张走向末路,但20世纪20年代初,它仍是中国报刊为数不多的格调严肃的报刊,这给副刊的传播实践提供了有力度的受众市场。此时的副刊即使是从1923年6月开始出版《文学旬刊》,但它并未似后来徐志摩主编后那样完全的文学园地,鲁迅在这期间与其他众多新知识分子一同,为晨报副刊带来了更多冷峻哲理性的救世格调。《晨报副刊》的经济方面一直处于较好的运行水平,这点是自诩“为生卖文”有分量的有专业水平的作家愿意向副刊提供稿件的另一要素,鲁迅也曾多次提到索要稿酬事件,也正是这种物质基础辅以媒介印刷技术(改版后16开发行,独特的页面设置),与逐渐被打破的文化选材传统规约所带来的高出版内容水平,使一份地方性的报刊拥有了全国性的受众,各种社会文化团体的“争锋”在媒介文化生产过程中极力挖掘了报刊传播潜力。上述表格中鲁迅持续有影响力作品的面世,正是通过当时副刊可能提供的“多元思想对话”冲突得以发掘出批判论点,而平民化新型读者的崛起,也推动了鲁迅在创作上更加注重对新一代青年人的引导传播,那些带有明显政治性倾向的青年读者对报刊论点的回应,更加促成了鲁迅对知识分子团体新的自省思考与对青年人价值选择的批判,如《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而那些具有文艺批评性质的受众群体,又给了报人作家更深度的“生存变革”写作。

鲁迅由早期的揭露民族劣根性的民族精神创作,面向带有“封建色彩”的市民大众,到关注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杂文创作,引导更多新文化运动后产生的青年读者建立理性的时代价值观,这不仅是日报印刷技术发展与时代革命发展趋势下所做出的个人“战斗”选择,更是对作品更好传播的考虑。作为一个选择“活在时代”的伟大作家,他选择性地用最能“即刻反应”社会的文体,“表述”出自己那个急遽动荡社会的爱恨憎厌,“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从《晨报副刊》的创作转折开始,他将西方文学理论中曾被不屑为之的杂文,用时代思想的精深度、社会思维的敏锐度,结合个人艺术创造力与洗练生动的文笔,超越了当时就事论事

的浅显时评,发展成以战斗性为本体,思想性、艺术性为表体,深刻性、及时性为辅体,易感性、同传性为主张的新文学样式。这种独特风格在对鲁迅的文学史研究上给后人留下了他割舍掉鸿篇巨著的创作遗憾,却留下了一个跌宕时代的另一种缩影。

二、《晨报副刊》时期(1919-1924)鲁迅的传播精神转型

《晨报副刊》所能提供的积极的传播公共空间,让鲁迅独特于其他作者的时代感与知识分子犀利的文化自觉性,通过作品的渐变创作践行了其传播文本与哲学思维的变革。报刊与作品相互促进中成为社会启蒙的一种传播语境,作家自身也在这种文化传播与启蒙哲学思潮接受的双重效果中,完成了自身的学术化与政治启蒙化的思维转变。作品的“思想革命”是新知识分子对于当时各种流派思潮的“中国化”、“个体化”的“变形”,价值观分歧后,一部分走上了文学文体阐释,一部分走向了传统国学分析,一部分继续了文化的时代转型,以鲁迅为代表的一部分新知识分子毅然选择了现代民族之魂的文化建构上,《晨报副刊》这段历史脉络,见证了鲁迅以哲学思维革新为内在创作力的传播精神转型。

鲁迅对国人本质的深入揭示与不留情面的社会批判,作品中相对辛辣讽刺的“谩骂”以及“求新声于异邦”的文学理论主张,让当时甚至整个20世纪“非议鲁迅”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但《新青年》有幸刊载《狂人日记》,《晨报副刊》因《阿Q正传》而独得盛誉却已是当今不争的事实。社会学者冷纳(Daniel Lerner)曾在“传统人”与“现代人”之间设定了一个“过渡人”的概念作为对生活在转型时期社会的人的称呼,因为“一方面,他既不生活在传统世界里,也不生活在现代世界里;另一方面,他既生活在传统的世界里,也生活在现代的世界里”^[11]。在今天看来,“过渡人”的概念用来形容鲁迅是最贴切不过的。通过发掘鲁迅在《晨报副刊》刊载作品的哲学阐释,可以透视他在转型历史期的基本着眼点,即对近代社会文化弊端的犀利感受。在中国社会变革时期,在近代知识分子分化的阵营中,鲁迅顺应媒体传播特点调整自己的创作文本,深刻对社会生活及文化自觉的理解转变其文学价值尺度,审视西方思潮与民族传统文化重构现代之舆论启蒙,在黑暗复杂的政治形势与繁乱的文化传播中坚持审慎的研究批判思维,成为了那个转型时期拥有精神领袖气质的“过渡人”。

经历过“新文化”运动各种社会思潮冲击的鲁迅,在“五四”运动后的几年首先开始了哲学心境的转变。《晨报副刊》登载的作品与译作显示了鲁迅仍力主无情的批判,但在对时势与整个社会传播领域感受孤独和彷徨时,他转向了具体的文化现实与知识分子价值选择的斗争。其时政治氛围稍松,新闻事业重又良进,报馆林立,学派各逞笔锋,发其政论,鲁迅的小说虽却多隐喻揭示国家社会本质,但因反感政治性介入而文章相对少与政评。对一切政治事件抱有怀疑和批判精神的鲁迅在各种运动迭起的时势下,渐渐选择了一种为当下的中国而奋斗的“速朽”创作哲学观,从副刊登载的针对一时一事而评议的文章也大都非为

“不朽”之观点。鲁迅从最初在《新青年》的随感录到副刊上的杂文创作,选择了放到报刊特别是日报这样能将其抗争精神迅捷传递出去的媒介平台。《晨报副刊》在李大钊、孙伏园的兼容办刊编辑观念上,大量从各界各流派采稿,虽然常由于对各种社会思潮都给予广泛传播给读者一定混杂的出版印象,却也正给了鲁迅、周作人、郁达夫以及其他许多当时并无半点儿名气的文学青年一个表达传播自己的机会。作家与媒介一起促成了当时激进的舆论语境,反过来又推进了鲁迅在传播思维中的哲学自省,大概归为以下三点。

(一) 补偏救弊的编辑哲学

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存在着一种“老年哲学”,即是在真正悲愤、痛苦的情绪下,在一种亡国亡天下的政治心态里流露出来的济世哲学,《生降死不降》就流露出这种情绪。鲁迅作为文学革命的旗手,以《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学灯》、《少年中国》等刊物为主要阵地^[12],将最初完全“改造整体社会”的希望渐转向“改良人生及国人精神”建构新型民族精神的现实选择标准,并成为这种“补偏救弊”哲学的佼佼奋进者。鲁迅认为“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13],这种“参与式”的济世思想贯穿其一生的创作,也是他与当时其他知识分子如林语堂等人最后分道扬镳的主因。对于只要可以借助一定传播平台就得以“一念耿耿,摇旗呐喊,课徒授学”的鲁迅,在当时天风海雨、迫人而来的时代氛围中,他引导着一代“实存”感受思想者做了最坚定的选择——新的现实主义文化创作与知识分子在各种流派中“补偏救弊”的价值判断,这在他作品里批判章士钊、胡适等人的文化哲学观得以体现。

因为《晨报副刊》在李大钊手中奠立了一个良好的基底,成为一个政治、思想启蒙宣传的媒介平台,开启了像“自由论谈”、“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家庭问题”、“科学世界”等热点栏目,能充分利用大众传媒与公众舆论的功能从社会各个层面去传播新思想新风尚,才使得鲁迅愿意将自己个人对时事的见解刊登于此。虽然他说是“因为先前的师生——恕我僭妄,暂用这两个字——关系罢,似乎也颇受优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费,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杂评,有时也送些稿费来”^[14],其实是与《晨报副刊》本身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责任感分不开的,其中更多名人著章及评议在启蒙民智和扩大社会影响力上亦给了鲁迅在副刊创作的更大推力。后来孙伏园的离开使得不少文学名家也陆续不再刊登稿件与《晨报副刊》,后又经徐志摩接手踏上另一个文学高峰已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在当时北京报界前者仆而后者起的年代中,《晨报》因数易统系内名员令其编辑内容随之变更,为报刊的“美中不足”,但大体上,报人“对于社会、国家、民族,负有指导诱掖规谏纠正之责”的天职仍算力尽其责,认为“一言之出可挽狂澜,一字之谬能误苍生,所谓不冠而王者在此”^[15],鲁迅在《晨报副刊》所载文章内容等多维度性亦可知论证这点。另外,对现实事件的一事一议,借助副刊这个

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媒介对当时的部分“传统”、“过偏”思潮给予犀利的反击批判,对软弱的守旧者给予讽刺调侃,都可看出其早年痛快淋漓的前卫批判,少了他人哲学思维转折后带着些许绝望与彷徨的知识分子末路的感触。总的来说,副刊的激进态度和自《晨钟》开始报纸对人文、国家、政府问题等的持续关注,促成了鲁迅对国人奴隶性本质揭示与批判各“不合于世”文化流派的力作走进了世人的眼中,促成了他转向自我精神弱点认知的“补偏救弊”文化自省。媒介重视编辑的思想进步性与在内容上适应时代潮流之音兼具各方的改革,是在政治专制与社会动荡稍微利好的媒介外部环境下,给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名流在飘摇的年代从未失去进取之心的最有力支撑。

(二)“兼容并包”与对传统的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也是在批判中成长的,只有以“设定距离”的理性对传统的负面因素进行时代的客观批判,才能令当时及后世研究者有一个健康的评议心智。“五四”时期及之后的一段历史阶段,中国的知识分子延续了传统学者从复杂的“人世”和事件中激荡出来的真切感受,对人群社会、政府社会、个体阴暗面有着个体的实践理念。风雨飘摇的历史背景,使得当时传统的治国保家理念被西方启蒙运动代表的人文精神所打击,整个传统文化机构遭到了破坏,不论是政治机构、社会结构、教育结构都无一例外,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零落。但西方外来的东西包括学术问题在中国文化内部却没有相应的存在机制,即使在今天这种“西学中国化”仍造成一定困境,整个西方运行机制在一定程度附着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哲学理念上。这就如鲁迅一样,内在是个传统的中国文人,在时代洗礼中接受西方哲学思维的淬炼,但传统并非一打就倒,它如影随形地弥漫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年代,也正因为这样,那个时代最具反传统代表性的鲁迅就有着它存在的历史理由。同时“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6]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想亦体现在亦反传统的鲁迅身上,但这种反传统是在时代中的权衡选择,而非全然的摒弃,这在《不周山》希冀在传统的土壤上建构新民族魂的立意中可见一斑。《晨报副刊》此时对各种哲学、思想倾向文章“百家争鸣”的刊载推动了众多学者对整个社会批判的维度,推高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杰出思想家在学术上的碰撞冲突。

另外,鲁迅先生一生的精神矛盾在此时亦可见端倪,这也是研究认为早期的鲁迅“不至绝望悲愤如斯”的一种“文人乐观天下事”的精神,甚至被人传诵的《阿Q正传》都是因感到被孙伏园每七天就要交出一篇的催稿而趁着孙伏园出差之际将阿Q枪毙了,这也是他早期频频谈论死亡、坟墓这种多具象征意义的剖析,却仍抱着一个文人幽默乐观心怀希望的具体体现。从鲁迅此时在副刊登载的文章,无法将他与后期被人批评为“悲观主义者”、“虚无主义者”过多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作为一种在社会转型期的“过渡人”鲁迅其本身的哲学精神就是独特的。他抱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底蕴,用西方的批判思维否定传统,却又怀具着中国文人历来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宗教理想,这种历史性的独特选择,常被人以

孤独与反叛来解释。

事实上,纵观当时的历史,将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二者相关联建构在一起,形成自己的历时性分割性思维的名流们都为中国留下了浓重的遗墨,唯鲁迅是因从未踏出阵地且旗帜鲜明的完全批判抗争而生活在那个年代,就像苏格拉底一样选择死在那个时代,但在严格意义上,他却又不完全属于那个时代。鲁迅特殊的敏感性反映在其报刊作品中,将时代的文化冲突、思维冲突体现在评议性自省中,西方的理性主义与启蒙主义给了鲁迅批判的源点,当时的现代主义思潮又给了他“非理性”的个体前锐态度。他这种全盘的批判性,对于李大钊期望为新文化运动进行左转至马克思主义的《晨报》“政治启蒙”时期,唯有一篇《一件小事》刊载其副刊的文化心理原因之一。直至鲁迅为副刊亲自命名为《晨报附刊》,孙伏园开始主编“小说”、“浪漫谈”、“杂感”等综合性“思想启蒙”栏目,虽延续了李大钊直面现实的办刊特点,但更加多元化的自由办刊兼容理念,才促成了当时看重个体主观精神自由为批判原则的鲁迅大量文章见于报刊并得以传播于时下。在当时双重历史基础上,此时期的鲁迅选择了从个体人文角度去批判现实,在《新青年》转为谈论政治与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政论性刊物的现实情况下,他选择《晨报副刊》作为一个新的公共舆论空间,把自由本质、反叛与个人主观性选择置于哲学思考中心,当然这也是他后期坚持与追求单纯信仰的徐志摩时期的《晨报副刊》对垒批判的思想源头。

(三)《晨报副刊》与鲁迅对“自由”的解读

鲁迅的思想与时代的病痛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本身就是时代文化的问题,当时追求国家、社会、群体、个体的崛起与自由是整个时代的气息。而当时引进的西方启蒙运动的精神哲学都是可以和社会发生的问题进行学理性关联,这也是本文认为那个时期的鲁迅处在一个时代转折点的缘由之一。任何东西的建立都不可能不借助传统的资源凌空而建,鲁迅对政治、社会的“公共主义”自由本质的解读,促使他结合《晨报副刊》提供的舆论平台进行“一事一议”的发稿,对当时的政治建构、社会制度设计等方面从本体到作用展开针对性的批判,作为一个“在此”的人,他迎合报刊的历史发展脉络,消化吸收文化中的批判传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负载者。

其中鲁迅开始对“人”的悲剧性的历史性理解,使得他把个体的超越性染上了深深的浪漫主义色彩,这对他后期更致力于国民性特别是各阶层思想的重新建构上起着一种哲学思考的历史依据,也是他对于孙伏园时期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内容的理性启蒙“提供相助”的源动力。媒介尽力拓宽自己的语境空间,保持相对独立和个性的特征,将推动社会进步发展作为一种主题责任去践行,才能促使不同的文化思潮和艺术方法蜂起,这也是鲁迅认为的“自由”本质体现之一。此时期的《晨报副刊》不趋于一般大众消闲趣味,立旨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格,与鲁迅反对“众治”、“大群”的所谓民主制度的哲学观相符,副刊力邀并刊载思想界、文化界等精英名流的作品,这种思想的自由撞击也使得副刊一时

星光熠熠,这种对于进步思想的海纳百川的气度,也相符于鲁迅早期将思辨的概念当作对现实历史性的理解,以及他对特定时代的中国现实相关个体的“最初自由”概念的理解。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自由”传播思维,在当时对因西方文化思潮冲击与现实抗争不得志而造成中国本土文化分子进行的分层,给予了一定引导意义上的缓冲,将程度不等的文明、文化势力间的游离与对峙,进行了一种内在态度上的接纳。这点可由本文表格里列述的对事件评议及对偏弊思潮批判的作品中得出结论,这段时期的各流派自由的思维冲突也为鲁迅由中期的绝望孤独的矛盾抗争转至后期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转折提供了实践的指向。

《晨报副刊》这种媒介平台在宏大横向的文化传播中所造成的社会效果,正如 W·H·R·River 曾认为的“两种或两种以上之文化,在其历史之基础上,必有新特质发现,为任何原有文化中所不具备者”^[17]。也正是这样的相对“自由”的传播氛围,使得鲁迅慢慢完成了深层的文化心理分裂,正如他在《坟》中审视自己认为的“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在双重文化的基础上,他一方面为了引导青年的个体性的超越让他们“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18],一方面为了寻根络而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认为“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19],实践了他致力于严谨下自由“拿来”的治学态度。作为一个与“同时”社会角色有着极大冲突的时代传播者,鲁迅借助于这些自由独自奋战、并经得起孤独考验的作品,在读者心中去感受和还原他“改良人生”的自由哲学观。研究者则通过这些打上了作家个人时代烙印的传播文本,感知他“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的孤独感及“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前驱的自由使命^[20],回溯那个时代的特殊的自由开放又传统固封的话语空间。

三、结 语

在《晨报副刊》筑建的公共语境相对开放的时期,鲁迅所主张的“文化批判”的社会启蒙改革,有着个体与历史互动后的选择意义。他对“智识阶级”进行文化传播时注重抗争性的一贯坚持,也是他被后人誉为“生在那个时代—死在那个时代”最有力的写照,他后期感叹自己“在手头的只有笔墨”,正是这种深刻的斗争感在时代的推动下,让他能一直走在最敏锐的文化感知前端。鲁迅在《晨报副刊》的“成功”及后来的对垒批判,都是他对于“文艺救国”应该怎样传播与被传播的批判思维实践,而副刊在当时选择立足于中国现实问题,针对性地传播引导大众精神导向,也是鲁迅在这份渐趋与众不同、散发自己独特魅力的报纸上创作的印证。即使之后《晨报副刊》在徐志摩手中又达到了另一个新高点,却成为鲁迅的批判对象时,如之前所言,那是针对于知识分子在文化传播价值观上的分层,是对于个体社会存在感与哲学思辨上的不同聚焦点。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震颤了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封建道德价值体系,也使新旧知识分子或文化流派阵营走向了不同的裂层。鲁迅也在社会与文化转折时期这种独特的传播环境与文化语境下,延伸着自己个体相对社会主体

精神轨迹的思索,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渐渐将自己“零散的一事一议”进行批判否定,转换成真正具有内在完整律动性构建出的存在主义者,而《晨报副刊》时期他在思想上的矛盾则成为一种纵向的研究参照。文化与个体、文化与民族的基本哲学性的思想框架,是《晨报副刊》及当时中国大多数先进报刊的基点,是新文化思潮在动荡社会传播并与时代名流互相成就的锻造历程。鲁迅以其严肃独特的“反传统”的历史新生性在“无物之阵”“横站”于中国思想文化场域中,“在广泛吸收前人的文化成果和当时的科学精神的同时,把中国人的黑暗视线由‘中世纪’的黑暗王国,引向了现代文明”^[21]。

注释:

[1]《晨钟》第一号,中华民国五年八月十五号,星期二,即旧历丙辰年七月十七日。

[2]由鲁迅起名为“晨报附铸”,却由书法家题写刊头时将“附”写成了“副”,此为“副刊”名字两种来源之一。

[3]现在的教科书一般是从新月社与《新月》杂志来命名新月派,事实上文学上的新月派应从徐志摩时期的《晨报副刊》算起,后来的《新月》杂志无论是作者群体还是文章内容都太复杂。

[4]崔银河:《〈晨报副刊〉与鲁迅》,《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4 期;王吉鹏、袁慎浩:《新文化传播视域下的鲁迅与〈晨报副刊〉》,《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

[5]刘洪珍:《现代报刊事业的发展与鲁迅杂文的产生和演变》,《国际新闻界》2008 年第 6 期。

[6]鲁迅:《两地书·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484 页。

[7][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 1 版),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34、56 页。

[8]指周作人所译日本佐藤春夫小说《雄鸡的烧烤》所得的稿费,该文载于 1921 年 7 月 9、10 日《晨报副刊》。潘公指潘垂统(1896-1993),浙江慈溪人,文学研究会成员。后改题《牺牲》,载 1921 年 9 月 14 日-19 日北京《晨报副刊》。

[9]孙伏园:《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鲁迅回忆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 年,第 95 页。

[10]参看《晨报副刊》1923 年 6 月 16 日刊载鲁迅致孙伏园的来信,孙伏园的附答。

[11]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78 页。

[12]转引自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

[13]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20 页。

[14]鲁迅:《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69 页。

[15]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年,第 431 页。

[16][明]顾炎武:《日知录·正始》。

[17]斯密司、马林诺夫斯基等:《文化传播辩论集》,周骏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 24 年 9 月初版。

[18]鲁迅:《华盖集·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2 页,最初发表于 1925 年 2 月 21 日《京报副刊》。

[19]鲁迅:《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28 页,最初发表于 1926 年 2 月 2 日《国民新报副刊》。

[20]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439、441 页。

[21]孙郁:《20 世纪中国最忧患的靈魂》,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年,第 2 页。

[责任编辑:黎虹]